

“欧洲年”倡议的 无果而终

——尼克松时期的美欧关系考察 (1972~1973)*

王雯菲

摘 要：尼克松政府在1973年提出“欧洲年”倡议，希望通过与欧共体国家对话，一揽子解决存在于两者间的经济、军事与外交问题。其本意是利用美国在军事领域的优势，迫使欧洲在经济领域让步，给予美国驻军开支补偿。但是事与愿违，欧共体各国不仅对“欧洲年”倡议反应冷淡，而且加快了自身经济、政治一体化建设进程。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深了美欧间的矛盾，“欧洲年”倡议最终无果而终。

关键词：“欧洲年”； 尼克松政府； 欧共体； 美欧关系

作者简介：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历史研究中心-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博士研究生 巴黎 75005

中图分类号：K505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5-4871(2018)01-0033-12

* 本文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(批准号:留金出[2014] 3024)。

20世纪70年代初,美国与盟国关系遭受多重考验:美国单方面宣布中止黄金-美元可兑换性、征收10%的进口附加税,引发国际经济及金融秩序混乱;美苏接触加深了西欧对两者达成秘密协定、“共管”世界的担忧;法国在核问题、国际货币问题上屡次针对美国发难;联邦德国政府开展“新东方政策”,推行独立外交方针。一系列问题使尼克松政府认识到处理美欧关系的紧迫性,于是在美苏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、中美关系缓和、越战和谈的背景下,将1973年定为“欧洲年”,使对外政策的重心回归至处理盟国关系上。

1973年4月23日,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美联社编辑年会上作主题为“欧洲年”的演讲时表示,“1972年,尼克松总统与敌对国家改善了关系,减轻了相互之间的猜忌和恐惧。1973年,我们希望与盟友达成一致,为共同理想和目标取得历史性进展”^①。“欧洲年”倡议是尼克松政府继与苏联谈判、与中国缓和后的又一项重要外交举措,是“尼克松主义”基于“实力”“谈判”与“伙伴关系”的具体实践。

在“欧洲年”演讲中,基辛格反复提及经贸、防务与外交问题。事实上,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,随着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改变,美国要求盟友承担起地区安全防卫责任的呼声日渐高涨。因此,重新塑造美欧之间的经济及安全关系,既是“尼克松主义”的目标之一,也是“欧洲年”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目前国内研究大多是从政治及外交角度解读“欧洲年”倡议前后美欧关系的变化,较少深入分析其形成原因及美欧围绕“欧洲年”展开的讨论过程^②。其实在冷

^① “Address by the President’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(Kissinger), April 23, 1973”, 见 Department of State, *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* (以下简称 FRUS), 1973-1976, Vol. XXX-VIII, Washington: U. S.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, 2012, doc. 8.

^② 关于“欧洲年”的论著,国内学者没有过多涉及,仅见于朱立群:《从“欧洲年”看美欧关系》,载《外交学院学报》,1987年第2期,第75-79页;赵璐:《“欧洲年”与尼克松政府的西欧政策》,载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》,2009年第6期,第61-64页;梁军:《“从未有过的年代”:基辛格“欧洲年”计划中的美英外交考察》,载《历史研究》,2015年第4期,第145-165页。国外的成果较为丰富,分别有从美、英、法、德角度论述“欧洲年”与美欧关系的文章著作,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“欧洲年”倡议前后美欧政治、外交关系变化等,如 Luck Nichter, “Richard Nixon and Europe: Confrontation and Cooperation, 1969-1974”,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College of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, August 2008, Chapter 4; Keith Hamilton, “Britain, France and America’s Year of Europe, 1973”, *Diplomacy & Statecraft*, 17 Feb 2007, pp. 871-895; Pierre Melandri, “Une relation très spéciale: la France, les Etats-Unis et l’Année de l’Europe, 1973-1974”, in Association Georges Pompidou, *Georges Pompidou et l’Europe*, Paris: Editions Complexe, 1995, pp. 89-131; Ardrik Klaassens, “Edward Heath, his vision for Europe, his Government and Henry Kissinger’s Year of Europe”, MA thesis for History: Political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ies, August 2011.

战进程中，西方阵营内部同样充满矛盾，美欧以“欧洲年”为框架进行的谈判便是一个缩影，它集中展示了双方在经贸、安全与外交领域的冲突。本文以美国外交档案、基辛格电话记录和手稿及英国海外政策文件为文献基础，通过梳理“欧洲年”提出的背景、美国的谈判策略及美欧会谈情况，以期阐释“尼克松主义”与“欧洲年”之间的联系，并探究尼克松政府在实现与敌国缓和时，处理与盟国关系的方式是否得当。此外，20世纪70年代初美欧关系对当前美欧相处模式亦有一定借鉴作用，毕竟经贸及防务问题至今仍是双方争论不休的重要议题。

一、尼克松政府的国际战略考虑与美欧关系中的问题

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，世界格局发生较大改变，主要表现为西欧和日本的复兴，共产主义阵营的内部分裂，亚非拉新兴国家的崛起，世界趋于“政治多极化”^①。1967年10月，尚未担任总统的尼克松在《外交季刊》上发文表示，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角色将会受到限制，美国需要建立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机制：第一，由地区国家组成遏制威胁的集体安全体制；第二，其他国家向美国寻求集体援助。^②

1969年7月，作为总统的尼克松在关岛宣布美国的亚洲新政策。他指出，除非盟国受到核大国威胁，否则美国鼓励亚洲盟友承担本国国防安全之责，并避免再次卷入越南式的战争。该政策的核心在于敦促美国盟友“独立地、或与邻国一起，在防卫安全领域承担更大的责任”。^③尼克松在关岛的宣言后被称为“尼克松主义”，是美国在自身能力减弱、世界多极化格局出现的情况下，协调美国利益及减轻海外负担的尝试。它鼓励和支持亚洲、拉美和欧洲实现自我防卫，着重强调美国在联盟中单方面指挥及承担责任的时代将成为过去，美国正在从“主导地位变为一名伙伴”。^④因此，“尼克松主义”的一个核心即是减少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义务，“将美国从无限制的全球参与，转向权衡轻重缓急、有选择地确立重点地区”。^⑤

作为战后美国财政、军事援助力度最大的区域，西欧成为“尼克松主义”的主要

^① Henry Kissinger, *American Foreign Policy: Three Essays by Henry Kissinger*, New York: W. W. Norton, 1969, p. 56.

^② Richard Nixon, "Asia After Viet Nam War", *Foreign Affairs*, Vol. 46, No. 1, October 1967, pp. 113-125.

^③ "Editorial Note", *FRUS*, 1969-1972, Vol. I, doc. 37.

^④ "Summary", *FRUS*, 1969-1972, Vol. I.

^⑤ 戴超武：《基辛格-尼克松的“宏大构想”、尼克松主义与冷战转型》，载《南开学报》，2007年第5期，第19-27页，这里第23页。